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以企业为中心

屈庆超

3月20日至25日，我随民革中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组，赴浙江、安徽开展调研。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收获颇多。

从企业角度看。创业者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可以说有激情、有意愿、有行动，但痛点也很多，未来空间很大！

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各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已经初步探索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从发展趋势角度看。总体感觉，按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步走的标准，多数小微企业的数字化管理依然处于初期阶段，数智赋能的路还有很长。

调研途中，我问了自己三个问题：谁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最需要什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什么？我在调研中、调研后也在不断寻找答案。

截至2022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为1.69亿户，其中企业5200万户。从企业生存周期看，对近10年（2013年至今）退出市场的2200多万户企业进行测算，我国企业的平均生存周期为4.4年。其中，54.1%的企业活不过3年，71.9%的企业活不过5年，88.7%的企业活不过10年。而美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周期是7年左右，日本是12年左右。目前在营企业中，有43.1%成立于2020年以后，91.2%成立于2010年以后，仅有不到2%的企业成立于2000年之前。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上数据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市场主体的发展必须从“增量”的上半场，进入“提质”的下半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以企业为中心，要围绕让中小微企业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活得更有质量开展工作，破解转型的堵点难点问题。

中小企业最需要三样东西：一是开源，需要获客平台，解决订单从哪里来的问题；二是节流，节约成本，数字服务不能成为企业负担，要以降成本为导向；三是提质，提升企业的组织效能、研发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推进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最缺的也是三样东西：一是缺师傅，创业需要教练，要有适合的行业解决方案；二是缺资金，我们需要阶段性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上用“三个一点儿”解决，即企业出点儿、平台让点儿、政府补点儿；三是缺平台，特别是缺少具有一定公益属性的平台，浙江和安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见到成效的探索经验。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多年行业经验和深入思考，我认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有很好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可实施可推进的方法路径，还要有工具手段的支撑。为此，提三点建议。

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品难、成本高的问题。建议甄选一批通用化、标准化的数字化产品（如营销软件、财务软件、招聘软件、办公自动化等），通过“政府补点、服务商让点、小企业掏点”的筹资方式，为中小微企业发放“数字服务包”。如安徽省依托“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每年推广3万个软件服务包，有力带动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是解决大中小企业融通难、小企业不会转的问题。建议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开放信息平台和数据资源，通过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供应链平台，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融合上链、协同创新，让中小微企业融入大企业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带动其数字化转型。如浙江省探索“链主引领+配套跟进”的“链式”转型模式，激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系统共享、数据互通，实现了订单、生产、库存、财务“四协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解决数据共享难、公共服务平台运营能力不足的问题。建议基于区域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政府、社会、企业多方数据融合，对中小微企业精准画像，并根据中小微企业特征和发展需求，匹配产品、推送服务，实现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的转变。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经济大脑”，对涉企数据进行深度融合，为企业精准画像、精确适配服务，促进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政府服务企业和组织产业的能力。

总之，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坚持以企业为中心，要从“产品赋能－产业链赋能－生态赋能”综合发力，解决转型中的成本、技术、平台等关键问题，助推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龙信数据研究院院长）

最大潜力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本报记者 杨朝英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没有捷径，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实干为要。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时提出，要深刻理解、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在实践中找准突破口，不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他的建议是，以人的城镇化为突破口，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推进高质量发展。

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具体方略之一。

报告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高度浓缩的文字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诉求。

我们的专访，也是围绕这个主题逐渐展开。

立足国情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记者：事有缓急，物有本末。您提出，加速农民市民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立论逻辑？

刘尚希：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代，农民问题一直都是根本问题。这是由我国农民多的这个基本国情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理论上，要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表明，我们追求的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中，从户籍角度看，依然是农民占了多数。如果没有农民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是不完整，也可说是不成功的。

具体到城镇化。城镇化水平、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发展质量高低的一个指标。同时，城镇化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城镇化过程，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当然不能脱离这个大多数，不能脱离农民为主体这个基本国情。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6%，达到64.7%。这是巨大历史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况且，现在的城镇化率统计中，有2.9亿农民的市民化转变是不彻底的，成为既是“新市民”，又是农民的双重身份。

记者：重大战略一定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更不能缺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支撑。

刘尚希：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历史上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过程有巨大差别。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也有自身的演进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从1954年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强调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从物质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人的现代化，这是发展递进的过程，也是相互支撑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成为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动力和基础。人的现代化是目的，也是手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但最终都要落到人的现代化，才能形成持续不竭的动力。

现实逻辑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扩大内需，需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重点是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能否有效提升。扩大内需战略的支点中，消费和投资是关键。其中，投资不是独立于消费之外的。只有大部分人有消费能力，投资才有可持续性。只有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消费才能真正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点依然在农民。

连续2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党中央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中，我们既看到中央的重视程度，也要看到任务的艰巨。

深化改革 加速破解“二元化”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要加速推进城镇化，难点、堵点是什么？

刘尚希：主要的难点在“二元结构”，潜力也在于此。

比如，公有制实现形式中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城市中的国有经济和农村的集体经济。当前，国有企业通过“两权分离”改革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成为适格的经济主体，是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竞争力也在逐渐增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现在的难点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是特别法人，成为法律上的市场主体。农村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促进了农地流转和资源优化配置，但农民的这些财产权利以及其他权利，并没有形成可自由交易的规范市场，在法律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优化。比如，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等等。尤其是要进一步推进解决农村土地与国有土地等财产权的同权同价问题，以及农村财产的有序流转，畅通城乡资本与农村资源的对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形成。

还有身份、治理等方面的“二元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推进解决。

记者：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普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

刘尚希：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面向未来，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与历史成绩并不矛盾，而是一脉相承、不断前进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支撑我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巨大的历史成绩。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另一个事实，农民市民化、城镇化的进程，是慢于工业化的。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乡村经济没有规模效应、公共服务也没有规模效应。农村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只能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辅。这种产业结构增加值低，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有限。可以做到脱贫，但要走向共同富裕，则需要“换轨”。当下，靠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方式，既不经济，也不环保，更不符合历史潮流。乡村容纳的就业、产业是有限的，过多的人口滞留在乡村将会落入长期低收入的状况。

因此，我们要抓住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核心这个底层逻辑来深化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着力破解“二元结构”，围绕“人”来做文章，给创业、创新、流动更大的自由。

补齐短板 加速推动农民市民化

记者：您认为，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任务要求，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刘尚希：我们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能通过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办法，应该统筹考虑农民的未来取向：不离土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农民。乡村振兴主要针对前两部分农民，而城镇化主要针对后一部分农民，通过自由流动变为市民。沿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方向，包括满足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计划、有步骤逐渐解决。

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需要的人会逐渐减少。减少农民数量，促进农民市民化是一条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是一场影响深刻、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这既是我们要补的短板，也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从理论上讲，农业社会只能诞生相对初级的经济体，市民为主体的社会才能不断深化分工、持续扩大经济体量。经济理性是利益导向，社会理性是诚信导向。市民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商业理性越能起到约束、引导作用；社会活力越强，经济发展潜力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不断扩大，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记者：从政策抓手角度出发，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刘尚希：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作出了全面部署。在落实过程中，需要政策之间的协调，形成合力。具体讲，有三点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以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为抓手，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社会化改革。

有研究表明，农民变成农民工，其消费可扩大30%；从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市民，其消费又可以扩大30%。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最大潜力也在人的城镇化，这都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为条件。

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当时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社会”，时至今日在某些领域仍有所表现，比如城乡二元体制。以所有制和户籍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又反过来制约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二是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最近10年有1亿多农民变为了市民，年均1400多万人，但依然有近2.9亿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却在就业、上学、社保、养老、住房等方面难以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这显示出进城难的一面。另一方面，农民工挣的钱难以变成资产积累财富，如回到农村盖的房子，盖成之日就是贬值之时。农民的财产没有市场估值，农民也难以“出村”变成真正市民。农村“三块地”的改革和农村产权市场的培育亟待提速。

三是区域规划、公共服务、投资布局、转移支付、编制安排等都要“随人走”。城镇化是人口流动的过程，意味着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将转向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的城镇体系。要素、产业、人口聚集的动态过程，将逐渐改变我国的经济地图、产业地图和人口地图，各项区域政策要从习惯于打“静靶”变成打“飞靶”，前瞻性预判人口的空间布局趋势，让公共服务找人，而不是让人去找公共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傅川：

回力鞋畅销的产业密码

本报记者 杨朝英

“这鞋质量确实好，我年轻时就买过。”

“最近我也买了一双，给孩子也买了一双，质量一点儿没变。”

“这可是个老品牌了，还在卖。可谓是经典老款了。”

……

3月下旬，民革中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组来到安徽芜湖，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当调研组一行来到旷野科技有限公司时，一位委员的感慨引来大家热议。

据旷野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回力鞋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但这也只是他们代理销售的诸多品牌商品之一。作为直播电商，他们最大的一个直播间，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

“您也穿过（回力鞋）吧？”记者见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傅川对回力鞋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便开口问道。

“当然穿过。那你知道当年它为什么火吗？”傅川反应迅速，不仅回应了提问，还顺势向记者抛出了一个问题。

对于这款风靡全国几十年、伴随几代人成长记忆的国民鞋，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底儿厚、有弹性，而且有一定的腰身贴脚，跑起来不容易掉。迄今，这也是它的卖点。

对于傅川来说，这个答案太过平常了。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他的观察视角具体而有力度。“因为它能承受双脚尖直立，托起整个身体而不塌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霹雳舞流行时，它是最适合年轻人跳舞时穿的鞋。”傅川边说，边模仿了一个动作。

“年轻人是时尚的代言人，也是时尚的引领者。以前是，现在也一样。有了好的时尚载体，相应的产品自然就会随之流行畅销。”傅川的思考从对以前的回忆，延伸到当下乃至未来。

结合眼下情景、多次深入调研所见，以及国家提振消费的政策，傅川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无论是供给创造消费，还是消费拉动供给，“时尚+产品”都将成为标配，进而言之，文化赋能在经济大循环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当下，国潮兴起的背后，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装、汉服流行与回力鞋重回一线，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

因势利导，事半功倍。傅川认为，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面临一个飞跃的契机，我们要抓住它、推动它上台阶，至少需要在两方面多做些功课。

一是政府层面。除了政策引导、财政税收支持、服务赋能外，政府推动形成的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公共物理空间配置，也至关重要。比如，各地的开发区中，存在一定的第二产业退出闲置的物理空间，地方政府可以联合国企或龙头服务公司，将之进行一定的必要改造，低成本或者免费提供给创业者，进而降低社会创业成本。

二是技术层面。傅川认为，创业者应高度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比如元宇宙技术。植根于元宇宙的形象，天然具有时尚要素。“比如，一个元宇宙中的明星主播，可以同时在不同场景下出现，实现真人无法完成的分身效果。”傅川解释说。

人工智能时代 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怎么走？

本报记者 李元丽

ChatGPT的横空出世和升级，引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怎么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彭一杰认为，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应用，蕴含巨大的商机。

彭一杰提出，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构建了数据的基础制度体系，到今年全国“两会”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把数据定义为新的生产要素，并确立数据要素的市场地位，可以说，国家在着力统筹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同时，我国建立了很多大数据中心，布局了八大算力的节点枢纽，“东数西算”工程也全面启动。

数字经济的内在逻辑就是实现数据、算力、算法基础设施化的过程。彭一杰认为，这个过程中，数据是生产要素，需要基础性的制度促进流通；算力是新的生产力，需要推动国家新能源方面的优势，降低算力成本，实现算力指数级的增长；在我国芯片被“卡脖子”的大背景下，要发挥体制优势，通过规模优势破解单点上的劣势；算法作为新型的生产工具，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所以，AI是最大的增长动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AI的创新能力，需要国家层面来重点推进。

同时，彭一杰用了“挺严峻”这个词来描述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他认为，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其实都还处在“摸爬滚打”的初级阶段，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数据的可视化阶段。

如何抓住机遇？彭一杰表示，从增长率来看，在电气装备、铁路运输等领域，中国发展迅速，但是，在航空航天、IT、信息以及软件出版方面，中国占全球的份额还比较低，这些领域是未来很大的增长点。“如今，我国已经布局了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也给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破局带来机遇。一方面，企业需要充分理解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底层逻辑，提前规划布局，一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参与到国家算力网的建设中，比如积极参与立体化推进‘东数西算’与国家算力网等重大工程建设。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促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发力：总体规划、局部先行，优先解决企业最大的需求和痛点，分期建设逐步改善；从决策的角度出发，将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转型落地；重视数据治理，为即将到来的数据资产‘入表’做好准备。目前看需要付出成本，而未来数据会成为企业的资产。”彭一杰建议说。

助推数字经济 释放5G潜能

本报记者 李元丽

3月28日至3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推进数字经济”分论坛上，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就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分享了高通携手中国产业伙伴参与数字经济的实践经验。

“5G作为通用的连接平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孟樸表示，长久以来，高通一直在推动移动技术的创新，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共同发展。如今高通不仅携手合作伙伴推进5G持续演进，还将驱动智能手机变革的众多技术高效扩展至不同行业，共同利用5G、AI等技术赋能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同时，高通也始终致力于运用突破性的无线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连接美好未来，让创新科技惠及更多人。

目前，中国5G基站总数已超过240万个，国民经济有一半的行业在使用5G。中国正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加快5G网络与千兆光网协同建设。

在孟樸看来，5G作为通用的连接平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5G发展为5G赋能千行百业与丰富消费者应用体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认为，5G的发展不是“0和1”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演进和进步。

5G具有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海量连接等优势，这些功能的提升是逐步推进的。孟樸举例道，例如在5G频段上，高通与中国运营商、系统设备供应商、终端厂商等做了很多测试，推动5G毫米波的成熟与发展，希望能够为用户提供高速、低时延的大带宽连接，使5G能够更好地赋能垂直行业，进一步释放5G的潜能。

谈及未来发展，孟樸表示，随着5G的发展，5G+AI将帮助我们实现人与万物的智能连接。其中，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正在引领全球汽车向网联、智能及高效率方向演进。此外，作为无线科技企业，高通一直希望通过无线技术助力缩小数字鸿沟，让更多人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从2006年以来，高通“无线关爱”计划已经为全球2600万人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在中国，“无线关爱”计划累计开展了19个项目，累计影响约140万人。